

为乡村蜕变留影作传

□白 烨

李明春花费了四年多时间写就的长篇小说《川乡传》(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因为既立于作者常年浸淫的乡村生活,又饱含了自己的深刻感受与充沛激情;既内含了乡村改革和穷则思变的元素,又超越了脱贫攻坚题材的单一写法,实为近年来乡村题材小说写作中的一部厚实力作。

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厚实,历史的纵深度和生活的丰富度是两个重要标尺。《川乡传》从改革开放初期写起,并经由对曾氏家族百年历史衍变的回望,把历史的触角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而在书写当代乡村的历史性转型的主干线索中,又十分细致地表现了乡村由打破“大锅饭”发生的系列变革,串结起知青出身的基层干部欧阳生的人生经历等,使得作品生活气韵格外充实,内在意蕴十分丰富。倘若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深切的人生感受,要想写出这样一部元气充沛、血肉饱满的作品,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这种生活实感充盈、生活激情充沛的写作,正是身处基层的文学写作者的长项所在。

作为作者寻求自我突破的一部长篇新作,《川乡传》也显露出因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从而使作品枝蔓过多,读来时有繁缛之感的不足,但作者更想表达的当下农村的艰难变革,还是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时隐时现地得以彰显,实现了书写“包产到户”这段历程的初衷,并且形成了作者独有的一些特点。就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作品在两个方面的优长比较显见重要。

一、写出了农村变革的剧烈阵痛。

中国农村在1955年至1956年间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随后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取消了农民的财产权,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改革开放伊始,农村现状急需改变,农村改革首当其冲,既势所必然,又十分关键。

《川乡传》正是把川东城坝大队放置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之中,描写了其打破“大锅饭”走向“大包干”的步履维艰的过程。在展开主体故事之前,作品先讲

述了因突然去世的曾老爷子的遗孀曾杨氏的丧事而引起的各种纷争。地方乡绅、起义将领、反动人士……曾老爷子生前不断变换的身份使得该按怎样的身份对待曾杨氏成为争议甚大的难题。这一看起来与“大包干”相去甚远的故事,实际上起到了为“大包干”铺垫环境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也让人们看到,“大包干”即将登台的时候,一切并非风平浪静、河清海晏,在“阶级斗争”余风尚存的年代,作品借由生产队长欧阳生的感受,写出了“大包干”起势的种种不易。从县委书记的言语里欧阳生知道,县委想要实行的实际上只是改变一下评分方式,只想“打破碗”,并不想“砸破锅”。县公安局郑局长在与他聊天时,听到“大包干”三个字直惊呼,“那不是撬了人民公社的根子?!”长期浸泡于农村生活之中的欧阳生知晓现状的症结所在,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在队上的“决算兑现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提出了“包产到户,明天开始分田地”的最终决断。因为合民心、顺民意并戮力执行、不断纠偏,城坝大队终于由“大包干”开始,走上了在艰难变革中改颜换貌的发展之路。

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作品不仅不厌其烦地说明打破“大锅饭”的种种不易,而且擘肌分理地写出了打破“大锅饭”的核心所在,并一再强调“碗”与“锅”的区别。“大包干”所内含的“分户经营、自负盈亏”的形式,从经营到分配都旨在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是要真正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新路。作品里的如实描写与细切辨析,格外真切地还原了这段过往的重要历史,真正做到了为乡村变革的关键一战留影作传。

二、写出了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

地处川东丘陵地带的镇南乡城坝村,非属绝对贫穷之地,但多年来逐渐形成的“等靠要”习惯,却使不少当地人在打破“大锅饭”之后感到无所适从,脱贫致富之路也走得很不顺遂。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作者虽然将很多笔墨转向了知青干部欧阳生的坎坷际遇和人生运程,但还是用不少篇幅写到了城坝村脱贫致富的艰难过程。

城坝村乃至镇南乡的脱贫致富是由评选“万元户”正式开启的。尽管上级部门不断降低评选条件,村里仍然

找不出合格的人选来,连“够格”的农户也怕招惹麻烦不愿入选。评选的“难产”与勉强,让县上和乡上领导看到了改变人们观念的必要、开办乡村企业的重要性,遂放开手脚支持油坊、茶场、小煤窑、建筑队等小型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繁琴的旺盛饲料公司、繁轩的运输公司都先后发展起来,并克服种种困难在柿子坪建起了希望小学。

镇南乡脱贫的最后“一公里”是居住在大山里的“十八户千年原住民”,他们虽由县乡两级责任干部对口帮扶,但问题的解决却极不顺遂。由于散住在大山的各个角落,他们习惯了传统的居住与生活方式,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只有两条路:要么为山上的各家各户通电修路,要么全体搬迁下山。经过欧阳生等人的反复权衡和掂量,确定了全部搬迁的方案。经过上上下下艰苦细致的工作,搬迁与安置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山上贫困户老老小小终于都有了妥善安置。在这一过程中,繁琴计划中的集种植、民居、休闲于一体的“梦幻田园”项目也顺利建成,成为当地一处靓丽景观和乡村旅游的重要品牌。这一切,正如欧阳生的继任者胡书记所感叹的那样:“农民回来了,农村兴旺了,农业也就振兴了。”

显然,写作《川乡传》,作者并不满足于只表现乡村大变革的单一主题,他还力图通过对曾氏家族“繁”字辈十几个人的命运传承与故事铺陈,表现乡土社会家族历史的演进与家族文化的影响;他还希图通过面临身世之谜与婚姻之变、顶着种种压力奋力前行的欧阳生,塑造一个知青出身的优秀乡村干部形象,续写“后知青”时代的“现在时”故事。但客观地看,希图在一部作品中实现多重故事的交叉表述,完成多个重要主题复式表达的意愿,或过于头绪繁复或超出作者既有能力,并未能完全达成,但串结在脱贫致富的主题与主线中的这些生活故事和人物命运,却使得作品比之单纯书写乡村变革更为丰满、更加厚重,起到了拉伸历史跨度、开掘生活厚度、延宕人生深度的诸种作用,使得作品复杂而不单一,丰盛而不单薄。这种有失有得、有长有短的情形,事关创作的奥秘与规律,显然很值得认真总结与切实汲取。

乡村干部真实的生命体验之作

□胡 平

《川乡传》的独特不仅在内容,也在于作者的经历。李明春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过来人,目睹过书中大部分情节场景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小说主人公欧阳生相似,李明春也是知青出身,当过生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公社管委会主任、乡党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也就是说,他不仅经历了当代乡村改革的大部分过程,而且一直参与领导了农民们的历史实践,单凭这一点,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信任和敬意。并且,此前作者已发表过3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是文学“川军”中的重要力量。他写的《山盟》由三个中篇组成,相互有沟通,写“帮扶”写得非常到位,人物塑造扎实形象,体现了作家的生活积累。这部《川乡传》修改了7稿,自己嫌“写得晚了点”,但有时写得“晚”也意味着积淀厚、思考深,好作品的问世不分先后。

写乡村和基层社会光凭想象不行。李明春这一代作家,大致曾长期生活在基层,在社会生活中饱经风雨,不知不觉积攒起素材,一旦开始写作,往往就能以扎实的生活和历史质感取胜。《川乡传》里有大量对旧日民情的生动刻画和对乡间场面的精细描述,今天读来让人感到又陌生又新鲜,如写到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候补社员”身份,能入户不能分口粮等细节,年轻作家肯定就写不出来。书中还写到,王书记是老革命,因为老婆定为文盲所以不能离婚,离了就属于蜕化变质,年轻作家也写不出来。农民参加社员大会是个福利,会场外家属们等着家长端出会议伙食,拿回家里凑成一顿饭等描写,都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而不是采访和想象。就凭这些,这个题材就值得写。

主人公欧阳生是个老知青,别人回城了,他还住在知青点,那种滋味是很凄凉的。他答应过“扎根”,甚至不好意思去考大学而留在了队里,后来从队长干起,成长为基层领导干部。这样一个人物,在当代乡土文学中很特殊,给人以好感甚至以同情,如果读者了解到作者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就会更喜欢欧阳生。虽然他最后并没有升迁到很高的位置,达不到有些知青返城后取得的级别就退休了,但他这辈子为当地做了不少事情:凭借文化知识建造起了高温大屋窖;在全县率先尝试实行土地承包,使贫人谷走出关键一步;曾带领村民们与供销社周旋,实现取款成功等。他遇事敢于担当,抵制过领导的“瞎指挥”,使沿山渠工程泡汤;他常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意见,曾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等。总之,他做出了一些扎扎实实的贡献,尽管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正派的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令人尊敬,也成为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作品通过他的经历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乡村发生的深刻变化。

而这位干部的另一大特点是始终都在思考,这也是作者的思考。他将“乡”与“土”分别看待,认为“土”是农村的物质形态,“乡”是农村的文化形态,二者密不可分。作者要求自己写出“人口与土地千年撕扯的痕迹”,他热情肯定了贫人谷的包产到户,但又继续描写了“大包干”后需要面对的新的农村现实,通过“大先生”这一形象提出了若干发人深省的乡村命题,这些命题至今还纠缠着作者,没有答案但很发人深省,这也是此作的重要价值之一。

作品中对曾氏家族命运的描写也很有意思,对此可以有各种理解,在我看来,作者在写“土”的变革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乡”的文化底蕴,使小说结构为一部更加完整的乡土史。作者太熟悉乡村了,书中写到,生产队开会时,农民们不会为谁鼓掌,只拿眼睛盯着对方就算欢迎了;开会一定要由职务高的先讲,要不然后面一定乱等等,都非常生动。小说中运用的乡土语言如“样样都得开金口露银牙,见啥管啥”“面糊糊能插稳筷子”等,也都很生动。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乡村干部真实的生命体验之作,有其确定不移的价值,向作者表示祝贺。

当下为何及如何为乡土立传?

□刘小波

李明春长篇小说《川乡传》评论

李明春的《川乡传》是一部以川东传统乡土社会的历史、裂变、转型来反映时代进程的作品。小说以贫人谷这一地方为窗口,透视出整个乡土社会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变。既是主题写作,同时也是一个个性之书。乡土社会可兹书写的內容太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风格的展现。无论是对物质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展现,作家都选择了最为恰适的一面。

小说是恒常因素与变量的交织,《川乡传》深刻地写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除了对神秘事物的信仰,作品还写到了传统中的诸多东西,各种处世准则、行为规范、道义坚守等。比如曾氏家族认为纠错比吃饭重要,这是他们的处世准则;张部长为曾杨氏的丧事操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恩,是一种道义的坚守乃至袍哥文化的体现。当然,作品书写更多的还是传统的消亡。新的文明在崛起,个体正在遭受转型的阵痛与机遇。个体和家族的命运辗转,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突出了农村改革的不易和蜕变的艰辛,但传统走了之后会如何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个体的蜕变、传统的消亡,乡土的未来在哪里呢?既有的认知和观念解体后,有没有一种新的力量出现?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小说有不少内容是关于人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浮沉的,这一地方涌现出一大批下海致富的人,商品经济的文明形态占据了绝对位置,也打破了“边缘”与“中心”的区隔。

主题书写的个性化叙述

《川乡传》在叙述层面上的个性化表达也十分明显。之所以谈如何叙述的问题,还在于这一选题本身写作者众多、限制和禁忌也比较多。主题出版物的写作常易陷入某种窘境,主题的限制难免有时会导致主题先行,使作品陷入概念化的图解困境。而《川乡传》在主题书写之外却发掘出了诸多可为其文学性加分的方面。比如作品对地方性知识的集中展现,截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面来展开,也不断强化地理标识。地方特性是小说着力书写的内容,自然景观、袍哥文化、地方语言、禁忌与习俗,等等。开篇用一场葬礼将这些东西展露无遗。但是,地方并不只是闭塞的,其实亦能够抵

达“中心”,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共振,一起奏响乡村变革的乐章,甚至在作品中还出现了走向世界的书写,如戴维雅这样身上带着洋气的人物、关于俄罗斯的梦想等,更是地方与中心的有力辩证。

作品在叙述的细节处理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要在语言的锤炼上下功夫。该书中使用语言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一种个性化色彩上,如方言的运用、语言的幽默风趣、贴近人物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共同出场,写人物,一串一串地写,人物众多,且都有名有姓、有血有肉,虽不是每一个人物都具典型性,但这正是每一位普通个体的真实写照,而所有人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典型性。比如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家就写出了一种野蛮中带着温柔、凶悍中带着体贴的女性形象,这正是一种乡土女性的真实写照,是在生活的细节中慢慢堆积出来的。作者还驾轻就熟地运用了各种符号修辞,象征、比喻、夸张、反讽等信手拈来,用一种微言大义

的笔法,将历史和人生的纵深都呈现出来。作品采用复调叙述,多线故事花开朵朵、各表一枝,叙述上倒叙、插叙、补叙诸多手法混用,没有陷入一种单一视角和单一的叙述推动,努力规避了主题书写可能会缺少艺术张力的弊端。最后谈一下“为什么要写传”的问题。李明春几乎是突然之间走向小说创作的。为什么要叙述?这是所有的叙述学理论在开篇都会强调的一个问题。叙述被认为是一种生命的必需,是人生在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小说家尤其承担了替人类叙述的职能。作家李明春反复强调写作的艰辛但又执笔不可,这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作品中出现的故事几乎都有现实来源。他曾是一名基层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生活,对中国农村社会非常熟悉,小说凝聚了他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也不乏自己的经历和影子。不停地思考必然就有叙述的冲动。四川这片乡土大地给作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加上有关方面对这一题材创作的扶持,近年来已涌现出了大量乡土书写的作品,无论作家是有意还是无意,乡土特征在其中都十分明显,体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而这些作品的价值亦需要进一步发掘。

《川乡传》写作中的两种思维

□白 烨

李明春是一位对农村特别熟悉的作家,他的小说基本上以乡村和小镇为空间,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特别浓厚。这说明他对乡村生活特别了解。当然这还不仅仅是生活气息的问题,作家并不是“自然主义”地呈现生活真实,并没有停留在“镜子式”地反映生活。作家长年浸润在乡村生活之中,其小说总会表达出对生活的不一样的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解。《川乡传》也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阅读这部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小说的内容也特别丰富,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复调小说,我觉得不完全如此,因为作品反映出来的多重性要比复调小说更为复杂。我个人觉得李明春在写作这部小说时脑海中有两种思维在交织进行,一种是自觉性思维,一种是潜意识思维。

自觉性思维突出体现在作家将这次写作当作一次主题性写作,表现农村的脱贫攻坚主题。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或者说单线条式地去写脱贫攻坚,虽然他这方面的生活资源很多,就像他曾写过的《山盟》一样,《山盟》基本上就是单线条式地写扶贫的作品。也许当作家面对这些和扶贫有关的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这些生活与人物所携带的更多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也触动了他的文学神经。于是李明春舍不得在表现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把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从这些生活中与人物身上剔除出去,这就有了他写作中的另一种思维,即潜意识思维。这种思维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给小说带来了特别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史。这一层次突出通过主人公欧阳生从当知青留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从而直接参与农村改革进程的这条主线而展开;第二个层次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共和国史,这一层次主要通过袍哥曾庆彪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及他的家族后来的遭遇这条线索而展开。

两个历史层次的写法也有所区别,改革开放历史主要是“实写”,袍哥曾庆彪的家族史主要是“虚写”。当然,自觉性思维和潜意识思维两种写作并不是不相关的,更不是相冲突的,二者具有一种对话与深化的关系。比如他写改革开放就有明确的目的,这一点在书中后记里说得很明白。他让欧阳生说:“大锅饭要改,共同富裕不能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说允许一部分人先穷起来。”这样他就把扶贫战略与改革开放精神连接起来了,他力图从历史的纬度上去理解脱贫攻坚的主题。

至于历史感的第二个层次,即曾家的家族史,在小说中同样很重要。作家将人物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情节也更多悬念,但这条线索的展开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故事性和戏剧性,而是带来了特别丰富的乡村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认识共和国历史的重要视角。曾庆彪的身份是袍哥,也是当地著名乡绅,娶了五位妻妾,还曾是国民党师长,后来起义立了功,但新中国成立后仍被当成反革命处死了。在四川农村,袍哥文化有重要影响,曾家的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川地乡村文化伦理和乡村民间制度。这一切曾在当时起到了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旧的伦理制度瓦解了,但新的乡村制度还未健全,更缺乏足够充分的文化支撑。包括过去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民间伦理规范和制度,也曾被当成旧东西加以否定了。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化上的重要变化,因此民间文化伦理中的一些良好的内容也在乡村得以复苏。小说一开始就写曾庆彪得以平反,随之而来的是张部长鼓励大家以传统的方式为曾庆彪的大老婆办丧事,并为曾庆彪迁坟合葬。这些描写具有一种象征性,象征了这一文化上的变化。

可以说,曾氏家族兴衰的这条线是与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乡村文化伦理的破坏、更迭、复苏和重建的历史轨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可惜,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在这儿,因此这一切主要流淌在李明春的潜意识思维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即使如此,我觉得也不应该忽略小说在这方面的思想价值。



李明春的《川乡传》是一部以川东传统乡土社会的历史、裂变、转型来反映时代进程的作品。小说以贫人谷这一地方为窗口,透视出整个乡土社会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变。既是主题写作,同时也是一个个性之书。乡土社会可兹书写的內容太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风格的展现。无论是对物质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展现,作家都选择了最为恰适的一面。

“史传”传统与“野史”笔法

作家将历史笔法融进小说中,努力从历史沉淀中打捞真相。作品秉持史传传统,具体操持的则是“野史”笔法,将正史与野史交织在一起。《川乡传》为乡土立传、为时代抒怀,具有书写历史的雄心和打造经典的野心。《川乡传》之“传”的选择本身就暗合着一种历史笔法,这明显与中国史传统相结合了起来。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一笔带过的“平反摘帽”、人民公社等计划经济形态,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精准扶贫,再到后来的一些项目建设已和乡村振兴有了关联。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作品多次写到普通人对历史变迁时往往是心怀忐忑的,足见历史对个人的影响。

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在小说中翻滚激荡,宏大的历史事件始终在场,就连主人公的知青身份也是历史的产物。但小说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史,而是正史与野史交融的笔法,甚至野史的成分、个体的历史书写占比更大。小说以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个体的情感与欲望为核心叙事要素,不断有各种传言的插叙和补叙,颇具传奇色彩,而叙述者在书写历史时惯用的“据说”一词,虚虚实实,又将历史的丰富性呈现出来,把个体化的际遇作为历史的根本性叙事。于普通人而言,历史只是属于历史本身,而小说正是一种由稗官野史演化而来的文体,野史化的处理模式也让作品的文学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现。

民间隐形结构与传统的更迭

关于野史化的笔法,还有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显,就是对乡土社会神秘性一面的书写。在民间,尤其是乡土社会,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其特定的应对和处理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思维理念,这些都可看作是一种民间的隐形结构。《川乡传》是一部从多个层面关注民间文化、风俗、信仰、认知结构、思维模式的小说,作品将地方乡土的民间认知和民间信仰进行了集中展示。比如开头部分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写迁坟和葬礼,小说中还有另外几场葬礼,都是对民间生死观的直接呈现。小说还多次写到川乡人对鬼神